

## 烟台故事

## 往事如昨

## 山东汉子砌硬墙

## 马刺

王锦远

王吉永

在昆嵛山的深处,牟平磨王格庄村就像一块被岁月磨旧的青石板,窝在鹰嘴石的东边。从明朝初年起,王家祖辈就在这儿扎根,跟青石打起了交道,锤起锤落,一片片磨盘从这里发往胶东各地。他们压根没有想到,在日后的岁月里,能跟北京、跟人民大会堂扯上关系。

时光流转至1958年8月,蝉鸣裹挟着灼热的暑气。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,全国上下都沉浸在建设新中国的澎湃热潮中。就在此时,磨王格庄的十一位石匠响应上级的号召,背起钢锤和凿刀,踏上了进京之路。他们或许还不知道,自己即将参与的工程,将在天安门广场勾勒出新中国最恢弘的建筑弧线——人民大会堂的花岗岩墙体,正翘首等待着这群山东石匠的凿刀。

罗福佑对那段岁月的记忆,永远定格在脚手架上的月光里。时年二十七岁的他,手持鑿子,在三吨重的花岗岩上凿出第一道墨线。“云南石匠雕廊柱,咱山东汉子砌硬墙。”他那布满老茧的手掌在石材上轻轻敲击,以石匠独有的测量术判断平整度:声音清亮,便知石材达标;若闷闷响,则需再凿三锤。

二百多个日夜,他们把每块石头的误差都控制在0.1毫米。墙缝严得插不进刀片,连苏联专家都说:“中国石匠的手就是标准的水平仪。”来年5月他们从首都返回家乡,除了大红的奖状,还带回了11套簇新的绿军装。

这手艺不是凭空来的,磨王格庄人祖祖辈辈与石头打交道。北山上的采石场,断壁上至今还留着斧凿印子。鼎盛时,村里三百多名石匠同时开工,锤声在山谷里撞出道道的回音,犹如威武雄壮的交响乐,连天上的云彩都不忍离去。他们打出的磨盘一度曾卖到烟台、福山、文登、乳山,大半个胶东半岛都曾用过他们的活计。村里的男孩子十岁就开始学握凿,十五岁就能独自采石,磨盘的十几道工序,早就刻进了骨头里。也正是因为这一片片的磨盘,村子便得了个名字——磨王格庄。

磨盘的精妙之处,集中体现在磨眼的设计上。上基(片)磨盘凿有“一大一小”双孔,直径4厘米的小孔,是粮食研磨的第一道入口;直径8厘米的大孔,则是研磨成粉的第二道入口。两孔的设计,不仅可以有序地控制磨粮的节律、提高研磨的功效,而且还可以利用空气动力学的原理,较好地解决研磨时粮食的壅塞和回流。上下磨盘每基(片)八铺(组)七十二齿呈放射状排列,每盘齿纹倾斜约45度,这是历经六百多年摸索得出来的黄金角度。在这样的设计下,粮食从磨眼滑落,会被长齿匀速导入每条短齿,每片磨盘上8个“扇形加工区”能让小麦三遍成粉。老石匠王芝明更是身怀“听音凿齿”的绝技,仅凭锤鏊相击的声音,便能判断齿深是否均匀。他打造的磨盘,使用起来省力三成,出粉率还能提高五个百分

点。这些凝聚着智慧与匠心的技艺,不仅支撑起村民的日常生活,更为他们承接大型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上世纪80年代,烟台化工厂硫酸塔的订单,让山村迎来短暂的回光返照。近百个用青石凿成的圆槽,每个40多元的加工费,让村里第一次响起自行车清脆的铃声。然而,面粉机的轰鸣很快便淹没了石匠的锤声。1985年,随着最后一锤落下,曾经兴盛的石匠产业走向衰落。但石匠们的智慧与技艺,并未完全消逝。

村中央有两座石桥,是罗福佑1957年设计的。一座圆拱的叫太阳桥,一座箭头形的平顶桥原叫星光桥,现在叫喜旺桥。桥面全是楔形青石咬在一起,没使一斤水泥,到现在还结结实实。太阳桥心石上的红五星,风吹雨打这么多年,还看得一清二楚。有一年市里的一位工程师得知此桥后,曾特意驱车前来桥下,趴在桥底测量,他发现每块石头的受力面都是精准的抛物线,不由地感叹道:“这是拿锤子算出来的力学公式啊。”这些石桥,既是石匠技艺的见证,也承载着村民们对往昔的回忆。

磨王格庄村能有“磨王”的名号,不光靠乡亲们的勤劳和手巧,北山上那条千米长的“青龙白虎”石线也起了大作用——青石和花岗岩交错在一起。如今再看这条石线,早已是坑坑洼洼,青石层被凿得像蜂窝一样,处处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。

最后一批石匠中,只有周义成留在烟台石料厂,直到临终前,嘴里还念叨着“想到人民大会堂去看一看”。这份对石匠事业的执着与牵挂,令人动容。

去年秋末,文物贩子开着皮卡闯进山村,用十几元的低价,将村中残留的百余片磨盘全部收走。王可治老人抚摸着磨眼,叹息道:“他们不知道,这小孔里曾装着整个秋天的麦香。”

夕阳为鹰嘴石镀上金边,那道被敲掉的鹰嘴尖,仿佛是时光留下的缺口。南方人或许认为这破坏了风水,却不知正是这看似的“破坏”,让磨王格庄的名字,永远镌刻进了人民大会堂的墙壁里。

如今,机械臂在村头的石材厂切割出完美的弧线,而磨王格庄的石匠们却坐在墙根下,沐浴着温暖的阳光。他们很少再谈论当年的锤法,只是偶尔瞥见电视里闪过的人民大会堂镜头时,浑浊的眼睛里,会突然亮起如鏊子撞击石材般的火花。

当双磨眼、八铺齿、干缝墙的传说逐渐模糊在凿刀与石屑的交响里,那些被岁月反复摩挲的技艺,终将随着最后一方磨盘的裂痕沉入时光的河底。但磨王格庄石匠的手泽并未湮灭——他们掌心的温度早已嵌进人民大会堂的石壁,让每一道冷硬的大理石纹路都成为会呼吸的年轮,在穿堂而过的风里,低声翻涌着永不风化的传奇。

(致谢王可治、李元伦、刘坤亭等先生提供相关信息)

## 一

上世纪50年代中期,我在烟台三中读书的时候,班主任经常换,一任班主任就干一学期,再开学就换老师了。三年中担任班主任时间最长的,莫过于袁老师了。袁老师是教我们平面几何课的老师,她整整给我们当了两学期的班主任。袁老师平日挺和气,总是笑盈盈的。她从来不批评我们,但她用另一种方式照样对我们要求很严格。

我爱看课外书在班上出了名的,虽然爱看书,但因生活困难,手里没钱,自己从来没买过一本课外书,全是向有书的同学借的。既然是借的,就要懂得借书的规矩,除了保护书的整洁无损外,最重要的一条就是“言必信,行必果”,信守诺言按时奉还。为此,我总是把时间利用到极限。

初二上学期期末考试前,大家都集中精力复习准备考试,看课外书的人少了,课外书相对也好借一些。我自以为平日学习基础好,课外书照看不误。复习期间,我借到一本长篇小说《风雪儿女》,书中内容是描写解放战争时期,鲁西南人民协助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包围、消灭还乡团的故事。书中情节离奇曲折、扣人心弦,就差30多页就看完了,实在难以停下,只能上课看了。可是下一节课是袁老师的平面几何课,我自作聪明,提前用一张旧报纸给小说包了个书皮,上面用大字写上《平面几何复习题》,然后又离开我第一排的座位,坐到后排的空位上,前面被高个同学挡着。趁袁老师正在专心致志地给同学们讲例题,我在后面偷偷看起课外书。正当我被故事情节感动得如痴如醉的时候,袁老师突然出现在我身旁。她把书拿去后,一把就把书皮撕掉,这一下显出了庐山真面目。袁老师把书举起来,对全班同学讲:咱们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,你看王吉永同学还有心思看《风雪儿女》!袁老师故意把《风雪儿女》说成《风雪女儿》。全班同学的眼睛像无数只探照灯一起聚光射向我,弄得我满面通红、无地自容。下课后,袁老师把书还给我了,并说:老师不反对你看课外书,但你不应该上课看。现在正是期末复习的关键时刻,班上同学哪有看课外书的?袁老师话不多,但像妈妈对儿女的关心,让我心中涌动着一股暖流。上课看课外书这件事,让我感到深深的自责和愧疚。

## 二

我读初中那段时间,劳动课特别多,每学期都要下乡助农,特别是到麦收季节我们吃住都在农村。记得有一次我们到西陌堂村割小麦,每个人把着一垄小麦(5行)割,这个活开始没觉得怎么累,可是时间一久就觉得,腿蹲时间长了也疼,腰弯久了也直不起来。

农村干活的规矩是早晨先到地里干活,大约干两个小时后回来吃早饭。一袋烟的工夫上工的钟声就响了,再上山干一上午,中间休息一次,晌天后回来吃午饭。饭后打一个盹的工夫再上山干一下午,中间也是休息一次,傍晚回来吃晚饭。晚饭后稍事休息就要上山打夜班割麦子了。只见村里的4盏大

汽灯早已点亮,分别固定在麦田四周的杆子上,把麦田照得像白昼一样。一直干到很晚才回去休息,同学们每人手上都磨出水泡,个个累得精疲力尽。

第二天一早,上山的钟声敲响后,袁老师见还缺10个男同学。这10个男同学单住在农民闲置的小厢房里,地上铺了些苞米秸子,上面再铺上自己那点简单的行李,大家就睡在上面。袁老师去拍门,没有声音,喊他们名字也没有回应,可袁老师明明听见屋内有说话声,还听到男同学们约定,谁都不准给袁老师开门。袁老师索性不走了,就等在小厢房门口。一会儿,几个男同学去尿憋得不得不开门了。袁老师把男同学都叫出来说:我还以为你们跟着孙悟空去取经了呢,原来都在屋里。老师知道同学们都很累,可是若不抢着把小麦收到家,一旦天下起雨来,小麦还在地里,被雨淋了就会发芽降低质量,甚至霉烂。接着袁老师把她的手伸给同学们看,同学们看了袁老师的手后都想哭,只见袁老师两只手都是水泡,水泡已经磨破了,包手的纱布都黏在手上。几个男同学扶着袁老师,继续上山割小麦。

## 三

1958年,学校要新盖一所新教学楼——西大楼。为了节约开支,学校采取勤工俭学的办法,高中生挖土方,初中生去张家窑(当时的烟台砖瓦厂,位于现南山公园人工湖处)拉砖。我们三个人一辆大板车,袁老师说拉完砖后可以自由活动。

我和其他两位男同学是从南道(即现在的环山路)拉着砖回学校的。南道虽然不如北道(大海阳路)好走,但比北道近了好多。回来时已是下午了,我们又累又饿又渴,走到轴承厂门前,见地里有萝卜,经不住诱惑,我们拔了一个,分成三份,每人吃了一小块。吃完萝卜后,把砖拉到学校,卸在工地上。见走北道的同学还没回校,我们三人就地一坐,下起了五子棋,我不会下棋,只能当观众。

正当我们下得起劲的时候,我见袁老师笑容可掬地向我们三人走来。我高兴地告诉他俩,袁老师看咱们比其他同学回校早,准是来表扬咱们的。这时袁老师已走到我们面前,笑着说:你们干起活来生龙活虎的,怎么这么早就完成任务了?我们刚要答话,袁老师接着又说:你们回校之前还偷过人家萝卜吗?我偷看了一眼袁老师的表情,与来时截然不同,态度很严肃。我立马站起来,他俩也站了起来。我首先承认错误,保证以后永远不犯这类错误了,他俩也简短地承认了错误。袁老师接着说:你们能认识到错误,我就不批评你们了。不过我只能原谅你们这一次,下不为例!

班上同学有时在背后也议论过袁老师,说袁老师就爱讽刺学生。我想起我读小学六年级时曾看过一本书,名字叫《骑士与马刺的故事》,说的道理是,骑士之所以用马刺,并非是要给马造成伤害或凌虐,而是让马奔跑得更快,并且当马在路口处迷茫的时候,给马提示应该向左或向右的正确奔跑方向。袁老师的所谓“讽刺”,不正是“骑士与马刺”的写照吗?